

燕 赵 文 化 研 究 丛 书



宋辽金时期的河北经济



邢铁 著



科学出版社

燕 赵 文 化 研 究 丛 书

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

宋辽金时期的河北经济

邢 铁 著

科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属于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区域性断代研究,全书以唐宋时期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为参照背景,深入考察了北宋时期河北经济的持续发展、辽金时期河北经济的曲折发展。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本书指出,北宋时期河北经济兼具传统型经济与边防型财政的双重特点;辽金统治时期,在河北既有的对传统农业经济的破坏,也有新品种的引进和农副业新领域的开发。

本书可供中国经济史尤其是中国区域经济史研究者,高校历史学、经济史学研究生、本科生及广大历史文化爱好者查阅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辽金时期的河北经济/邢铁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燕赵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03-029397-8

I. 宋… II. 邢… III. 地区经济—经济史—河北省—辽宋金元时代
IV. F12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0300 号

责任编辑:王贻社 / 责任校对:赵桂芬
责任印制:钱玉芬 / 封面设计:捷艺轩

科 学 出 版 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源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1 年 6 月第 一 版 开本:B5(720×1000)

2011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5 3/4

印数:1—1 000 字数:268 000

定价:4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燕赵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总 主 编 王长华

副总主编 武吉庆 郑振峰 王宏斌

成 员 王长华 王宏斌 邢 铁 沈长云

谷更有 张怀通 张翠莲 武吉庆

郑振峰 倪世光 秦进才 徐建平

阎福玲 董丛林

前言

10~13 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的宋辽夏金时期。在这期间,河北地区陆续被辽、北宋和金三个政权统辖,一直是三个政权军事冲突的地区,也是民族融合表现得最充分的地区。专门研究此时此地的经济状况,对河北经济史乃至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整体认识会有所帮助。

学术界关于宋辽金时期河北地区经济状况的研究,主要有漆侠先生的《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1988 年)和漆侠、乔幼梅的《辽夏金经济史》(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4 年)、张家驹先生的《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程民生先生的《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和《中国北方经济史:以经济重心的转移为主线》(人民出版社 2004 年)、孟繁清先生主编,邢铁、王文涛著的《中国古代环渤海地区与其他经济区比较研究》(上册,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苑书义先生等主编的《河北经济史》(第一、二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等著作。近些年来陆续有一些就河北经济某个专题进行研究的文章,如河北的养马、林果业、水稻生产和丝织业等,内容都很充实,为本书的考察提供了基础。

全书共三部分:上篇探讨唐宋时期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问题,包括先秦以来北方经济文化重心演变过程的回顾,唐宋时期经济文化重心的逐渐南移、原因和对北方经济社会的重大影响,为准确把握宋辽金时期河北地区的经济状况提供背景参照。中篇、下篇是本书的主体内容,具体考察北宋时期河北经济的持续发展、辽金时期河北经济的曲折发展。北宋时期,河北属于“三北”地区之一,是



宋辽交界的北部边疆，在经济上历来是农业发达地区，这就使河北经济具有传统型经济与边防型财政的双重特点。不被重视则衰落，受到重视则发展，都缘于这个双重特点。辽统治河北北部、金统治河北全境期间，既有对传统农业经济破坏的一面，也有新品种的引进、农副业新领域的开发。例如，河北的畜牧业、林果业大都是在辽金统治时期发展起来的。辽军砍伐桑林以便铁骑驰骋；同时，宋军为了防御，在这一带种了很多树……总体看来，宋辽金时期，河北经济一直在发展，破坏和衰落是局部的、暂时的。

与宋辽金时期相比，近现代河北农业生产方面的最大变化之一是，这一带从原来丝织业生产的中心地区变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完全以棉花为衣用作物，丝织业几乎看不到了。这既是河北经济的一大变化，也是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的一个拐点。附录一、附录二就是为了进一步印证这个变化过程。

我的专业是唐宋经济史，所以这些年参与地方史研究的集体项目时，分到我名下的总是唐宋特别是宋代部分。时间长了，有了一些积累，现在利用做课题的机会，把有关经济史的内容重新整理。本课题被列为2006年度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并得到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强势特色学科的出版资助，特志。

邢 铁

2009年秋于太行脚下

目 录

前言

上篇 唐宋时期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

第一章 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重心的两次转移	3
第二章 唐宋之际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原因分析	21
第三章 经济文化重心南移之后南北差异的定型	26

中篇 北宋时期河北经济的持续发展

第四章 北宋的政治军事形势与河北的战略地位	45
第五章 行政区划和自然环境	50
第六章 人口状况和乡村基层组织	58
第七章 经济政策与赋役制度	68
第八章 农业及林牧渔诸业	80
第九章 居北宋首位的河北桑蚕丝织业	93
第十章 手工业	109
第十一章 商业和货币	131
第十二章 市场和市镇	144
第十三章 北宋时期河北经济的特点和影响	151

下篇 辽金时期河北经济的曲折发展

第十四章 宋辽金三朝关系概说	157
第十五章 辽朝时期的河北经济	164
第十六章 金朝时期的河北经济	181



第十七章 辽金时期的民族融合与经济进步	201
主要参考文献	203
附录一 宋代河北、京东地区的桑蚕丝织业	205
附录二 我国古代丝织业重心南移的原因分析	221

上篇

唐宋时期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

在我国广袤的版图上，有按山川地势划分的各级行政区，有人们习惯称指的地理方位如东北、西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还有更为细致的燕南、塞北、江左、岭南……这些不同范围、不同含义的区域称谓由来已久。其中，一个主要的基础性含义是因地理、人文等因素的影响而形成并被长期保持下来的不同地区的不同特色。

这里首先涉及一个敏感问题——地理环境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个问题的确非常重要，不过，这不应该是一个引经据典来辩论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通过历史过程的考察来印证的事实问题。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必在理论上专门论证这个问题，应该直接进入对具体问题的考察，即从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重心的两次转移入手，具体考察不同地区的不同社会特色是如何形成的，以此作为认识宋辽金时期河北经济发展状况的历史背景。

第一章

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重心的两次转移

所谓重心，是与其他地区比较而言的。史学界对经济重心转移的认定标准有两条：一是经济重心所在的地区的生产发展在广度和深度上超过了其他地区；二是经济重心所在地区的生产发展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不只是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居优势地位，而是有持续占优势的趋势，就是说，其优势为后世所继承。^①这主要是针对经济重心的判认而言的，推而广之，也可以用于文化重心的考察判认。

1. 先秦秦汉时期：形成黄河中游经济文化中心

我国最古老的文明中心，实际上也就是古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地区，主要在黄河中游地区。远古的石器文明最早就出现在这一带，稍后的彩陶文化分布于黄河两岸，黑陶文化的基地在山东沿海，郑州的二里岗、安阳的小屯有着殷商时代的文物遗址，这一地区被称为中原、四海九州之内的中央之国。直到 2600 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南方邻近中原的楚国才开始发展，东南地区的吴越诸国的起步更晚一些。经济文化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北方。

仔细分析，开始的时候，北方黄河冲积平原的经济文化重心并

^① 郑学檬、陈衍德：《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若干问题探讨》，载《农业考古》1991 年 3 期。

非集中在一处，大的集中地至少在两处——黄河中游沿岸和下游沿海地区。后来黄河下游沿海地区向西发展，与黄河中游文明区合在一起，这一过程可以称之为“龙凤文化”的结合。

黄河下游沿海地区最初的居民以渔猎为生，崇拜的图腾是“凤”。凤是风神，是渔猎尤其是靠打渔为生的人们所祈盼的镇邪神灵，因为对沿海打渔的人来说，最惧怕的是狂风恶浪，恶浪是狂风引来的，所以就祈盼能有一种超人的自然力量来管住狂暴的风浪。他们看到，每当风平浪静的时候，水面上有各种水鸟在飞翔；一旦风浪袭来，水鸟便没了踪影。他们对风浪和水鸟的出现消失原因做了相反的理解，倒果为因，认为之所以风平浪静，是因为水鸟在场的缘故；风浪肆虐则是由于水鸟不在，风浪乘机袭来。这便是《说文解字》上解释“凤”字时所说的，凤即鳳，是“百鸟之王，莫（暮）宿风穴，见（现）则天下大安静”，不出现时就天昏地暗，风浪骤起。凤的图腾崇拜就是这样产生的。事实上，并不存在与凤相似的鸟，凤是由各种鸟的形象综合创造出来的。

同时期西邻的黄河中游已经属于农耕地区，崇拜的图腾是“龙”。近年来随着“文化热”的兴起，很多论著对龙进行了研究，做出了种种解释，但始终脱不开龙与水的联系。龙是水神，是农耕民族的镇邪之物，因为对从事农业耕作的人们来说，既离不开水，又惧怕水，祈求水利灌溉，惧怕水患冲淹，所以也希望能有一种超人的力量来管住水，包括天上的雨雪冰雹和地上的河流湖泊。据古文化史专家推测，可能是当初的人们看到夏天雷雨交加的时候天空中的闪电，和地面上大小河流弯弯曲曲的样子，结合农耕环境中所常见的各种牲畜和走兽，创造出了“龙”的图腾。《说文解字》在解释龙字的时候说，龙即龍，是“雷电、水头之形”；此前的《左传》也说“龙，水物也”，属于管水的神灵。《说文解字》还进一步解释说，龙是“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巨能细，能短能长”，尤其是其

“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在天上的这半年正是黄河中游地区有雷电的季节，也是雨季洪灾泛滥的季节，需要龙来管的时候。与凤一样，龙也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动物，是综合了各种动物形象特征的产物，龙角似牛角，龙头似马头，都与农耕生活有关，是农耕地区的崇拜物。

最初黄河中游和下游两个文明区是并存的隔绝的，大约在公元前 21~11 世纪的夏商周时期，各地民户“不常宁”，“不常厥邑”，经常大规模地迁徙，尤其是殷商中期迁徙得更快，史称“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①，亳即现在河南省商丘南部一带；后又经过盘庚八迁，前后共十六次迁徙，才到了黄河中游一带。对殷商时期人们的迁徙原因，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解释为“避水患”；^②近年有经济史专家傅筑夫在王氏所论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认为迁徙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克服原居住地区的地力退化问题，才沿黄河南岸向西一步步迁徙。^③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把问题做进一步的解释：迁徙之前的殷商人在黄河下游有农耕部落，更多的是沿渤海南部的渔民，他们一起在国王的率领下向西迁徙，实际上是本能地向黄河中游农耕地区凑集，是渔猎向农耕的转化。

随着殷商迁徙的结束，殷人定居于亳，两个文明区合为一体，形成了更为发展的黄河中游的农业文明，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中原文明。从以上这个文明中心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中原农业文明是以黄河中游地区的传统农业为主体，吸收融合了东来的黄河下游地区的渔猎文明而形成的；就殷人而言，在这个迁移的过程中也由半

① 《史记》卷 3，《殷本纪》。

②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 12，《说契至于成汤八迁》。

③ 傅筑夫：《殷人的游农与殷人的迁居》，载《中国经济史论丛》上册，三联书店 1980 年版。

渔猎半农耕的部落转变成了农业部落。

这个融合过程也可以说是龙凤文化融合的过程，是凤靠近龙的过程。正因为如此，在习惯的称谓喻指上，龙为主体，以喻征服者，后来引申代指皇帝或男人；凤为客体，以喻被征服被吸纳者，后来引申代指皇后或女人了。本来，凤为雄，凰为雌，代指皇后或女人时应当以凰简称；但鸟类以雄性羽翼最美，人类则以女性最美，美美相通，凤与凰便性别混淆，以凤来专门代指皇后女人之美了。

附带说一下，先秦秦汉时期黄河中下游两个文明区形成的同时，西邻还有一个关中文明区，即渭河平原、八百里秦川。西周、秦、汉建都长安，就是以此为背景和依托的，司马迁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然量其富，什居其六。”^① 似乎比当时的中原地区更为富庶，但这其中包含着政治、军事因素所引起的财政集中、工商业发展的问题，不全是自然经济的农业文明。关中平原的农业文明起源也很早，与中原文明交相辉映，只是由于当时其独立自然地存在和发展，没有像殷商那样向中原靠拢。东汉以降直到唐朝，这一带仍然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但与之同时，中心已经沿黄河向东转移了，先是营建东都洛阳，继而又形成了开封一个新的中心；到北宋以后，由于关中西羌人的东进，加之这一地区的沙漠化问题带来的农业经济衰退^②，关中农业文明的发展势头减弱，影响也小了。

经济重心的第一次转移是以中原为中心，先是东邻黄河下游的殷商人西进，继而是关中平原文明渐渐沿黄河东下，共同维系和巩固了黄河中游的农业文明，使得这一地区自先秦到隋唐一直是全国

①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② 对于此时此地的沙漠化问题，笔者最早是1994年6月在宋史年会上听王曾瑜先生讲的，并参见李昌宪先生《司马光评传》第11页的论述，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经济文化重心之所在，以至于讲到中国古代文明，首先就是指以此地为中心的农业文明。

2. 唐宋之际：形成长江下游经济文化中心

黄河中游的中原文明独树一帜的局面一直持续到隋唐时期。其实，最典型的是先秦秦汉时期，东汉以降，南方的经济发展势头开始加快，魏蜀吴三国鼎立，从经济史的角度看，就是立足于当时的三个经济发展中心地区——中原的洛阳、西南的成都和东南的建康（今江苏南京），尤其是长江中下游的开发已经能够维系吴国政权达半个世纪以上，这是此前所没有的情况。到南北朝时期，东晋及南朝的宋齐梁陈也都建立在这一地区，长达 270 年之久；加之同一时期北方地区的破坏和衰落，相对于全国来说东南一带迅猛发展，在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与北方相抗衡，长江下游的发展赶上了黄河流域，形成中国历史上南北对峙的状况。南北朝的形成，深层的经济文化根源即在于此。

隋唐时期，从全国的财政状况看，越来越依赖于东南地区；易言之，隋唐时期经济文化的兴盛与东南地区的开发、全国经济文化开发区域的扩大密切相关。隋朝开通大运河，虽说是北达涿郡（今北京市附近），实际上却以洛阳为中心，主要目的是从江南往关中长安运粮物，而不是往东北输送战略物资，唐朝更是这样，这就把南北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通过南北的交流进一步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开发。唐中叶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全国的财政更加依赖江南，韩愈说当时的情况是：“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① 不过，并不是说此时北方的经济实力只占全国的十分之一，而是由于安史之乱以后直到唐朝灭亡，

^① 《全唐文》卷 55，韩愈《送陆歙州诗序》。

全国逐步陷于藩镇割据的局面，其中河北及中原一带的藩镇最为骄横无忌，“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①，并且“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②而江淮一带的藩镇则与北方不同，军队数量少，担任节度使的多是“儒帅”，很少征伐反叛，比北方安定守规矩。唐史专家张国刚先生指出，唐后期江南税赋占全国的十分之九，“除了江南地区本身的富庶外，主要原因就是这里养兵少，军费低，因而上供数量大。其实当时东南地区真正经济发达的地区只是扬州、楚州、润州、常州、苏州、湖州、杭州、越州和明州等，包括太湖流域附近的长江三角洲一带”，并且称这一地区的藩镇为给中央提供赋税的“赋税型”藩镇。^③从实际发展水平看，唐代仍是南北对峙状态，还不能说江南地区的发展赶上了北方。

五代十国时期，北方五个政权依次更替，八姓十三君，一个吃一个，一直处在征战之中；南方诸国尤其江南的吴、吴越、南唐等基本上同时并存，——这实际上仍然是唐后期两地藩镇不同风格的延续，因为五代十国主要是在唐后期藩镇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这期间，北方经济和文化因战乱继续衰落，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则又一次获得了可以安定发展的机会，也确实发展起来了，地位越来越重要了。张家驹先生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经指出，后周政权所以获得巩固，周世宗柴荣之所以敢于北伐辽朝，奠定了北宋统一的基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订了正确的战略——先南后北，先征服江南地区，用江南地区的财富供给北伐的军需；直到北宋的建立，仍然是以江南地区的财富为基础的。^④到这个时候，可以说江南地区的经济

① 《新唐书》卷50，《兵志》。

② 《旧唐书》卷141，《田承嗣传》。

③ 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第100～101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④ 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第7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发展已经超过了北方，形成了一个新的更大的经济文化中心。从全国来看，经济文化重心已经南移。

至于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具体时间，史学界有不同的表述。有的认为在唐后期或五代十国时期，有的认为在北宋，还有的认为是在南宋建立之后。实际看来，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是一个历史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从不同角度、不同行业看，南移的时间并不一致，比如丝织业生产重心南移的完成已经到了元明时期了。所以，对这个具体时间不宜过分追究，否则貌似精确实际上更不准确，概括地讲“唐宋之际”也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主要从唐宋两个朝代有关内容的对比中，考察一下经济文化的发展“南盛北衰”，即重心南移的具体表现。

先看农业生产。

江南地区的农业在北宋以后发展迅猛，超过了北方，这既与北方农业的停滞衰退有关，同时也是南方加快了土地开垦、水利兴修的结果，尤其是朝廷重视东南地区农田水利的修复和发展。早在十国时期，这一带就重视水利兴修，吴越钱镠在位时修治钱塘江堤和龙山、浙江水闸，并凿平长江中的巨石以利通航，被民间尊为“海龙王”，以至有“钱镠射潮”击退海潮避水患的传说。入宋以后对此更为重视，如江北捍海堰、钱塘江堤、西湖苏堤等，其中捍海堰全长500里，是范仲淹在兴化做县官时动用邻近四州民夫修成的，可以使靠近海边的农田免遭海水倒灌之患；浙江捍海石塘在十国时期就修建过，北宋张夏来任转运使时组织了万余名兵丁和民夫重修，并且随损随治；钱塘江堤在北宋时也经过多次扩修，真宗时发运使李博主持重修时，采用竹笼装石头的办法垒砌大堤，并打上木桩，坚固了许多；西湖原可灌溉千顷农田，北宋初失修，苏轼作杭州知州时开挖湖堤，疏通河道，修堰以蓄泄潮水，并附之以坚固的大堤，人称“苏公堤”；还有苏州通判徐奭率当地民众修石堤90里，桥梁